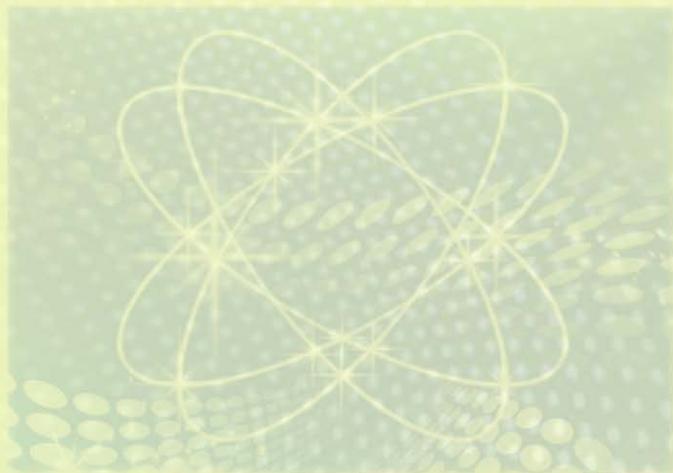


恭读朱子读书法

(南宋)张洪 齐熙 王□辑
张二江 校勘注释



广西人民出版社

恭读朱子读书法



(南宋)张洪 齐熙 王□辑
张二江 校勘注释

 广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 | |
|-------------------|-------|
| 序 | (1) |
| 《四库全书·朱子读书法》提要与原序 | (12) |
| 朱子读书法·纲领 | (19) |
| 朱子读书法·循序渐进 | (35) |
| 朱子读书法·熟读精思 | (66) |
| 朱子读书法·虚心涵泳 | (88) |
| 朱子读书法·切己体察 | (119) |
| 朱子读书法·着紧用力 | (130) |
| 朱子读书法·居敬持志 | (139) |
| 后记 | (145) |

序

一

中国人从小在父母、老师的督促下读书，几乎人人都有读书的经历。但我们不一定会读书。

我也是从幼儿园开始识字的。小学4年级开始读大部头小说。此后，读毛主席的书，读马列的书，读科技书，读书报杂志。在“文革”书荒年代，读一切能够到手的书。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各种汉译名著很好买到，且又身为“80年代大学生”，一些“禁书”读了，一些普世公认的好书读了，一些最新的“好书”读了。90年代及其之后，我的一个嗜好是逛书店，买了许多书，为了不当“书柜”，一周中总有3至5天读书到夜晚十二点之后。那时总感到读书的时间少，不过还是读到了不少该读的好书。2000年，北京一老同学送我一本复印的陈诚著《台湾土地改革纪实》，读后掩卷长叹，深恨未能早读此书。2001年之后，读书的时间突然多了，经常整天都能读书，尽管读书的环境在有些方面是太艰难了。2004年，老友赵林公送给我一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读后慨叹：作为一名历史系毕业生，过去几十年的书真是白读了。2005年老友陈浩武公送给我一本内地出的殷海光著《中国文化的展望》，边读边赞叹：中国毕竟有真有思想、真有学问的人。2007年，因《诗经》考证的需要，偶尔读到《古史辨》派的文章，这也是上大学时、平生未接触过的一个学术领域，遂把《民国丛书》的《古史辨》部分全部买来，全部读过。读过之后



觉得，一个中国的学者，若没有读过这些文章，简直就不能算是一个知识健全的读书人。读书而不读这样一些书，哪里算得上与思想者们有思想接触？自己的种种想法从哪里得到磨砺？最让我庆幸而又叹息的是，我在2008年到2009年阅读到了徐复观^{〔1〕}先生的书，虽然全是内地出版物，虽然删节很多，但我从这些书中感到的自己在思想能力、学识修养上与徐公的差距之大，几乎是余生所不可弥补的。而在思想上引起的共鸣最多最强烈，这是我所以庆幸的。叹息的是读到徐公的著作太晚。

且说“共鸣”，那真可说“触处皆是”，这里只说两条：其一，徐公被称为今世的陆九渊，今世的朱熹，而徐公自认为若说学有所成的话，得益于先师熊十力先生的棒喝，这棒喝是教他如何读书。而熊师据以棒喝的理论和史实依据，我以为是《朱子读书法》。我相信我的大学老师们都知道这本书，但在“文革”后，甚至在今天，他们要推荐这本书，仍不能不三其思而数啜其口吧。我半生没有得到这样棒喝的遗憾，难以描摹其强烈程度。我感到需要有真学问之师的棒喝。其二，中国人要做堂堂正正的人，做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立得住、自尊且受人尊敬的人，还只能做个中国人。要做一个这样的中国人，不自觉地陶冶于以经书为主体的历代圣贤的教导训诫以及行实之中，徐公认为做不到，我也认为做不到。

于是我读了《朱子读书法》，领受朱子的棒喝。按朱子所说，对照自己半生的读书生涯，我感到句句都是对我的棒喝。于是我觉得，有必要把这本书早早推荐给中国每一个能读书的人。这本书，越早读到越好，读得越通透，对自己一生的进德、致知越好。每个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照朱熹所说去读书，去践实，中国人若不会受到其他人类发自内心的尊重，像历史上三代时期所有过的那样，从而消除目前多见的那种对于中国人教养差的鄙视，那就怪了。

二

朱子所说的读书，是以读圣贤书为基底，以读一切书为辅助的读



书；是以进德、致知为读书目的，以读圣贤书为进德主要途径的读书，是边读边实践，让自己成为宇宙间第一等人格高尚的人的读书。读圣贤书主要是读经，《诗》、《书》、《易》、《礼》、《乐》、《春秋》、孔孟之书。照朱熹所说的去读书，再辅以现代知识环境下的新鲜内容，下学而上达，必能学有所成。学者能成为有真才实学、有良心的学者，普通人能成为一个言行有本的、有强固自信心的人。

这就有必要消除百余年来一个意识误区：凡提到程朱之学，便生反感的意识误区。

“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的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印象最深的是阶级斗争；朱熹的学说曾被元明清三代的统治者所“追捧”；朱熹便成了“地主阶级”的代表，当然也就成了一个常用的批斗对象。久而久之，大陆的中国人就形成了两个印象：一是朱熹就是假道学的代表；二是程朱理学是以理杀人，是中国“吃人”旧文化的理论基础。所以一提到朱熹之名，便立生反感之情。

我敢说，这种情绪全不是来自对于朱熹著作、生平的全面和平心的研究。而改革开放之后，还没有对于朱熹这一极为重要历史人物的平心而全面研究基础上的如实介绍。以至于直到今天，不仅一般人对朱熹误解深重，而且学者们也带着色彩很重的有色眼镜看朱熹、议朱熹。我所撰写的《风类诗新解》等拙著，字里行间，也可见这副不小的有色眼镜。

是误解，就应消除；是有色眼镜，就应该洗掉颜色，或干脆丢弃。让历史上真实的朱熹，立在我们的面前。在给《朱子读书法》这本书作注时，接触到了朱熹和与之有交往的皇帝、大臣、小吏、弟子、门人的文字，了解了他们的行实；了解了朱熹谆谆开导于人们的，只是要大家做一个像古代圣贤一样的好人、好官，只是要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开导人们如何做一个好人、好官。这是穿透任何时代的、在人们心理正常情况下任谁也抹黑不了、歪曲不了的正理正道吧。我了解到，在南宋时期，凡是信从、推崇朱熹的人，同辈人都是被人称道至今也不能有别说的好官、好学者；后生晚辈则都是在乡里被人尊敬、在官府为民所爱戴的好人、好官；那些视朱熹之学为“伪



学”的人，也已经被历史证明：他们是历史的罪人。而近代以来的那些“数典诬祖”者们，对朱熹以致对孔子的诋毁，又给我们这个“古老的伟大民族”带来了人性人格的提升吗？

我本人尚未全面细读朱熹的著作，对朱熹其人及其学说，给予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应给予的平正评价，是一个大题目，文章有得作。在这里，我只想引用徐复观公的话来稍为其正正名。

三

徐复观在《朱元璋的最后》一文中写道：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亦字仲晦)，他总结了宋代理学，因而使宋代理学得以发扬光大。当元人征服中国，杀人如麻的大黑暗时期，少数士人，在他的遗教中发现了灯塔之光，即以之驯服蒙古人残暴之性，更以之传播于社会，恢复中华民族创巨痛深中做人的立足点。后虽被明清两代皇权所利用，但在皇权专制中的一线光明，及社会中所保留的世道人心的基线，都是由利用“朱学”中所反射出来的。

……重读王懋竑著《朱子年谱》，读到他死前的情形，使我感动不已。为历史担当命运的人物，必然是来自他真实的人格与学问。由一套一套的假话所堆砌起来的伟大形象，结果只足成为笑柄。

朱元晦早有脚气病^[2]，到了庆元六年(1200)开春以后，病得更厉害，不断发生刺痛，他曾对他的一位学生说：“精神顿坏，自觉不能长久。”但他每天还是修改自己的著作，并向他的学生讲授。他是三月九日死的。三月五日，是他死前四天，夜读张横渠[张载]的《西铭》，并勉励他的学生说：“为学之要，惟在事事审求其是，决去其非。积累日久，心与理一(合而为一)，自然所发皆无私曲。圣人应万事，天地生万物，直而已矣。”三月六日是他死前三天，上午还改《大学·诚意章》，誊好后又改数字；又改《楚辞》一段。这天午后大泄，不再能起床。八日是他死前的一天，学生们到楼上问他的病，他勉强起坐向学生们说：“误诸君远来。然道理只是恁地。但大家倡率



做些艰苦工夫，须牢固着脚力 [站稳脚之意]，方有进步处。”九日午初刻，他便死去了。他最后所流露出的对学问、对学生尽心竭力的情形，使我感到自己该是多么卑微渺小。

……朱元晦在死前四天向学生讲话，谈到圣人天地时，不说“仁而已矣”，却说“直而已矣”。……此处所说的“直”，是与他上面所说的“私曲”相反的。“无私曲”即是直。私是指自私自利；曲是邪曲，主要是指说歪理、讲谎言、做邪事。竭尽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说歪理、讲谎言，以达到自私自利的邪事，这便是“私曲”。因此，直的内容是说正理、讲真话。

……与“直”相反的“私曲”，是顺从政治中权力的好恶而扩展的。最高权力者喜欢人顺从、恭维，所以他需要私曲之徒在他的左右，以满足自己隐瞒、装饰上的要求。而私曲之徒，只有搭上最高权力者的线，才能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并且他的歪理、谎言，可凭最高权力，使其风靡天下，扩大他的邪行，增加他的私利。在这种情势下，谁敢讲一句真话，谁人便会立受不测之祸。

……在韩侂胄当权、政治黑暗的情形下，朱元晦仍说：“只是不去击鼓说冤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说底话亦不敢说。”他老先生由此体验到，由于最高权力结合在一起的谎言、歪理压倒了整个政治社会，使整个政治社会都要跟着说谎言歪理，这是人类最大的黑暗。要从最大的黑暗中转出一线生机，便只有人能不顾私人利害，肯讲些真话，这即是他所说的“直”。但当时虽然没有今日特务的厉害，这一点也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而最大黑暗积累的结果，必然是一个民族的毁灭。断乎没有集体说谎、说歪理而能生存下去的。于是他的良心，逼使他仅余的生命底力，说出“圣人应万事，天地生万物，直而已矣”的话，把“直”的意义，提高到这样高的地位。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会是很微弱的，因为他的生命，已到了死的边缘。但这是震动天人作狮子吼的一句话。

我们中国之可悲，是在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允许面对最大最彰明显著的罪恶敢讲一句真话。一个犯罪者所编造的谎言，在最高权力者明示或暗示之下，必使它成为千千万万人的共同谎言，于是把千千万



万无辜的人也变成犯罪者的共犯。中华民族要翻身，必从有一席之地能允许人敢讲真话开始。(见徐复观著《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文中“()”内的文字为徐注，“[]”内的文字为张注。)

徐公在《程朱异同——平铺的人文世界与贯通的人文世界》一文结尾处写道：

我们今天试由朱熹的《文集》、《语类》中，看他所肆应的问题的广博，古今学术界中殆少其伦。他文字中条理的谨严，注释中训诂的精审，能受得起历史的考验。他的深切透辟、刚正恳笃的政治发言，是他的穷理与实践的伟大结晶。使对他的成见再深的人，只要良知未完全泯没，则不论是自由主义者也好，社会主义者也好，试略加对比，也应感到自己人格的卑微可耻。他在毕世生活穷困中的艰苦实践所开辟出的人文世界，试以下面一段话为例，不仅对我们民族堕落到今天这种样子，应发生振聋起聩的作用，并且也应对全人类有伟大的启发意义。他在答《吴晦叔书》中说：

近日究观圣门垂教之意，都是要人躬行实践，直内(使内在的道德之心直发而无所障蔽)胜私(战胜私欲)，使轻浮刻薄、贵我(尊崇自己)贱物(贱视他人)之态，潜消于冥冥(不知不觉)之中，而吾之本心浑厚慈良，公平正大之体，常存而不失，便是仁处。其用功着力，随人深浅，各有次第。要之，须是力行久熟，实到此地，方知此意味。盖非可以想象臆度而知，亦不待想象臆度而知也。

假定我们期待着“人把人当人”的世界，便应承认上面的话，既不迂腐，也不虚玄。我们试把上面的话，在自己生命中体认，向社会现实中体察，应当能了解他的意义。最奇怪的是，以宋明理学家的“即事穷理”、“在事上磨炼”的“躬行实践”，而居然有许多人说他们是“玄虚”，说他们是“阳儒阴释”，以他们的强调“去私欲”，并为穷苦人众呼号，因而想解决土地问题，却说他们是代表地主阶级，以他们的提倡人物平等而普遍共有的天理，因而想达到人物一体的有机体的人文世界，却说他们是封建主义。这种知识分子在权势下的堕落，正反映出我们民族在专制下的堕落。(见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



集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6月第一版。)

徐公在它处多次说到，朱熹是中国秦汉以后极少有的几位顶天立地的知识分子之一。这个说法，在全世界的华人社会引起了广泛共鸣。限于篇幅，此处就不再征引了。

四

《朱子读书法》这本书是朱子门人所辑集的朱熹关于读书的经验、心得和教诲，列在七个题目之下，为：

纲领

循序渐进

熟读精思

虚心涵泳

切己体察

着紧用力

居敬持志

我觉得，具体点说来，《纲领》是讲读书目的，读书必要，把书读好的途径。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是讲读书方法，是最为紧要之语。切己体察，是讲把圣人教导用于自身，让自己“脱胎换骨”、“变化气质”，即所谓的修身，从而使圣贤之说成为当下有用的东西，这是中国儒家所倡导的伟大学风的一种具体体现。着紧用力，是讲两个方面，一是致知，二是践实。这都须狠做工夫，吃得苦，肯用力。居敬持志，则是在学成的层面上更进一步，终生不懈怠，得能莫忘。

在七个题目之下的文字，有的不能严格按内涵划分、归类。这是中国古代学术的特点。好在这并不影响本书将朱熹关于读书的教导集中于一小册书的初衷，也不影响我们对朱子教诲的理解。

纪昀等给此书写的提要说：“条分缕析，纲目井然”，于朱子之学亦可称“覃思研究矣”。很是赞赏这本书。

徐复观在《应当如何读书》一文中写道：



至于进一步的读书，我愿向大家推荐宋张洪、齐熙同编的《朱子读书法》。朱熹真是投出他的全生命来读书的人；所以他读书的经验，对人们有永恒的启发作用。（见《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第200页）

五

如今的读书，与朱熹生活的年代，元、明、清的年代，毕竟是大不相同了。起码有两大不同，其一，因为社会分工、学科划分的细化，许多人须终生用主要精力阅读科技方面的专著。这些专著似乎与修进道德没有直接关系；修进道德与读通读好这些专著似乎也没有直接关系。其二，世界性的“逐利”心行，几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在这种氛围中去读经，去引导人们从小读经，似乎不合潮流。这一发展，在朱熹的年代和19世纪末以前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有读中国古典经书的必要？是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有按《朱子读书法》的指点去读经、读各种书的必要？我觉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不过，我还是引用徐公的话为我的这个想法提供支持。这样做的原因是，徐公在说这些话时，有相对宽松的说话环境，有不以读经为忌讳的环境，因而能够公开读经而有所成、能够公开讨论读经问题。

徐复观《当前读经问题之争论——为孔诞纪念专号而作》，有这样的话：

操专门之业，而其业与经有关的，如史学、哲学或文学等，皆应精研经中有关的部分，这是不待说的。至于一般读经问题，我认为在小学中应有若干经的故事，应选择若干切近而易了解的经中的文句，作学校中的格言标语，于周会加以讲解，使受了国民教育的人，知道中国有经，有圣人，有切身做人的道理。再将《论》、《孟》、《庸》、《礼记》、《诗经》中精选若干，共不超过一万言，或汇成为一篇，在课程中立一专课；或分别插入国文课本中，而将现在课本中许多无聊的东西抽掉，按其内容之深浅，分别在高初级中学中讲授，更于历史



中加一点经学史。如此，则学生之负担不加重，而经之大义微方，亦略可窥其大概。大学则应近于专门之业，以其所专者去治经，可不列在一般读经范围之内。

除学校教育外，我希望成年人，不论做何职业，手头能保持一部《四书》，可能时再加一部《近思录》，于晨昏之暇，随意浏览，我相信对于自己的精神生活总会有所培补底。但这只可出之于社会的提倡，而不可出之于政府硬性的规定。（见《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

在《两篇难懂的文章》中，徐公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一段话，是对纯搞科技者的喊话：

爱因斯坦说：科学方法，除了能告诉我们以诸种事实是如何的关联，及如何互为条件以外，什么东西也不能告诉我们。追求这种客观知识的热心，是属于人的最讨的事情，我决不轻视各位在此一方面所作的人类的成果与英雄的努力。但是，同样明了的事情，“这是什么”的知识，决不为我们打开直接通向“这应当如何”的门。不管我们保持有如何丰富的“这是什么”的知识，但决不能从这些知识中演绎出人类的目标，应当是如何的结论。客观知识，可以为我们要达成某种目标而提供强有力的工具。但是，人生究竟目标的自身，及想达到目标的志愿，不能不从其他的源泉产生出来。（A.Einstein:Out of My Later Years 日译本二十五页）（见《中国学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

在《怎样当一个大学生》一文中，徐先生写道：

科学是“非道德”的，但并非“反道德的”。……所以，世界上真正伟大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之流，必然会有他们的道德精神，乃至宗教意识。（见《中国学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

我觉得，一个中国人，要想成为世界上真正伟大的、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在确立自己的道德本体方面，必须也必能从孔子开创而为孟子、朱熹等所继承的经学中，汲取最为丰富而有益的营养。何况，朱子所说的读书法，用到读科技书方面，也只是一个举一隅而以



三隅反、触类旁通的事。

六

修《四库全书》时，此书因“卷次已不可考”，编撰者从权“酌其编帙，厘为四卷”。细读之，我觉得一、二卷可能是辅广初辑而张洪、齐熙为之分列于七个标题之下者；亦即，一、二卷是辅氏之旧，标题则可能是张、齐氏所立。三、四卷可能是张洪、齐熙、王口补辑。补辑的文字，分列在同样的七个标题之下，而在含义上，本可混合编于一、二卷所立的七个题目之下的文字中。可能张、齐为了不埋没辅氏之功，而将自己所辑编入了三、四卷吧。

在标点注释此书时，为了方便阅读，又不过于打乱原来文字的顺序，我把原来一、二卷的七个题目列为“（上）”，把三、四卷相同的七个题目列为“（下）”，即把三、四卷的内容并入一、二卷，把两组并列而又相同题目下的文字集中在了一起；不再标出原书所分之卷。七个标题之下，我列了一些小题目，并适当将内容相似的文字作了归并，但原有文字一字未作增删。

因年代久远，且从未有人对此书作过校勘注释，所以不免有错讹脱漏的文字。对原文实在无法读通之处，我都作了细致校勘，参考了《晦庵集》（《四库》文渊阁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本）、《朱子全书》、《朱子年谱》、《群书考索》、《经义考》等书，少数应补应删的文字，都随文作了说明。

因原文大多接近口语，所以未予今译，沉下心来读，不比读《水浒传》更难。句读难定之处，都参考它书经过了反复推敲，全文又经过了三遍通读，自觉错漏极少。

本书给一些含义相近的文字写了小标题，有些地方加了按语，以帮助读者阅读。因为学问浅陋，所作标题准确与否、按语得当与否，读者尽可批评。自认为态度还是非常认真的。

本书原有的夹注，放在圆括号“（ ）”内。我所作的夹注，全都放在方括号“[]”内，文字较多的注释，顺序标出后，放在一



节文字之末。这些注释，很花了些工夫，没有一条从现有辞书中抄录，且大部分是从未有人作过注者。注释所用资料，文字取舍上倚轻倚重可能是有的，好在为有心作深入研究者提供了线索，也为普通读者提供了方便。

唯愿这本书成为有志做一个循良正直中国人、甚至顶天立地中国人的人们的必读之书。

注释

[1] 徐复观：湖北省浠水县人。当代史上最值得中国人尊敬自豪的著名学者之一。因为坚决主张学者就是学为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民主政治，人性自由，主张中国的民主自由须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上，而与熊十力、梁漱溟、张群劬、牟宗三、唐君毅等先生一起被称为“新儒家”之代表人物。1949年之前，作为军人，衔至少将。1949年之后，毅然脱离政治，在将近50岁的时候进入学术领域。曾执教于台湾东海大学，后长期居住香港，从事学术工作。曾主编《民主评论》。著作分三类：专著，如《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等；论集，如《中国思想史论集》等；杂文，如《徐复观杂文集》、《徐复观杂文续集》等。徐复观在学术上坚决反对胡适等“全盘西化”的主张，正面严厉批评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之学阻断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以“元气淋漓”的文章，让处在近代大变动、大苦难之中的中国人，开始了重新认识自己祖先所创造的伟大文化的反思。

[2] 脚气病：中医疾病名。此病先起岭南，渐渐扩展至江东。患此病者初无苗头，有的微觉疼痛，有的两胫小满，有的行起忽弱，有的小腹不仁，有的时冷时热，都是这种病的症候。若不即治，转上入腹，便发气，则杀人。

张二江

2009年8月18日于米粮山

《四库全书·朱子读书法》提要与原序

提要

《朱子读书法》四卷，宋张洪、齐熙同编。洪字伯大，熙字充甫，皆江西鄱阳人。事迹无可考。

据张洪《自序》：咸淳⁽¹⁾中，分教四明⁽²⁾，齐熙适客游浙东，遂相与商确是书，而刻诸鄞洋⁽³⁾。其书本朱子门人辅广⁽⁴⁾所辑，巴川⁽⁵⁾度正⁽⁶⁾尝属〔托付〕遂宁⁽⁷⁾于和之〔《朱子语类》中有“和之问”三条，可知是朱熹授业弟子，余未可考〕校刊，鄱阳⁽⁸⁾王复广〔未可考〕为后编。张洪与齐熙又因而补订之，以辅氏原本为上卷，而以所续增者列为下卷。皆以《文集》、《语类》排比缀辑，分门隶属。虽摭拾抄撮，稗贩旧文⁽⁹⁾，不足以言著述，而条分缕析，纲目井然，于朱子一家之学，亦可云覃思研究矣。

元时板已不存。至顺⁽¹⁰⁾中，江南行台御史赵之维重镂于集庆路⁽¹¹⁾学，故《永乐大典》全帙收入。原编卷次已不可考，今酌其编帙，厘为四卷。俾讲新安⁽¹²⁾之学者有所考证焉。

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注释：

[1] 咸淳：南宋度宗赵璿年号，1265—1274年。

[2] 四明：代指浙江鄞县，唐以四明名州。

[3] 泮(pàn)：学校。鄞泮指鄞县县学。张洪可能是任县学教导。

[4] 辅广：字汉卿。号潜斋。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人。其先为庆源(治所曾在今河北赵县)人。先为吕祖谦弟子，祖谦没，执弟子礼于朱熹。熹深爱重之。著有《诗童子问》、《朱子读书法》等，《浙江通志》称其：六经有注，四书有“问答”，《通鉴》有说，师训有编，“日新”有录，杂著有稿。无疑是朱门高弟。

[5] 巴川：重庆市铜梁县城所在地。唐置巴川县，元时并入铜梁，县治在巴川。

[6] 度正：字周卿。朱子门人。广东合州(雷州)人，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明一统志》等误为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这一年朱熹2岁，质诸《宋史》本传所言度正生平行实，知其误矣)进士，历官为国子监丞。在朝正直敢谏，推崇朱熹之学。终官礼部侍郎。所著有《周子年谱》、《性善堂文集》。

[7] 遂宁：今四川遂宁市。

[8] 鄱阳：今江西省鄱阳县，在鄱阳湖东。

[9] 掇(jù)：摘、拾。稗(bài)：小。稗贩，有转卖之义，这两句话是指，此书是摘抄集辑朱子语录而成。

[10] 至顺：元代文宗孛儿只斤图贴睦耳年号，1328—1133年。

[11] 集庆路：元代至元十四年升建康府为集庆路，在今南京。

[12] 新安：代指徽州。朱熹本是徽州籍人。晋置新安郡于始新，宋改为徽州。



《序》

张洪

[《朱子读书法》原序之一]

圣贤之书，圣贤之言也。圣贤之言，圣贤之意也。学者，学为圣贤而已。既为圣贤之学，必将因其言以求其意，得其言而未得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其言而得其意者也。

傅说之告高宗曰⁽¹⁾：“学于古训乃有获。”吾夫子亦曰“好古敏以求之”，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见哂于圣门也宜哉。皋、夔 [皋：指皋陶，舜帝时的圣人、贤臣。夔(kuí)：舜帝时的贤臣，掌乐教。] 所读何书？世率以斯言借口。岂知帝王盛时，化行俗美，凡涂歌里咏之所接，声音采色乐舞之所形，洒扫应对冠昏丧祭之所施，莫非修道之教，固不专在书也。三代而下，古人养德之具一切尽废，所恃以植立人极 [做人的最高标准] 者，惟有书耳。此书之不可不读也。

然读圣贤之书者为不少矣，鲜能至于圣贤者，读之无其法也。汉唐说义理如说梦，其间大儒言正心而不及诚意，言诚意而不及致知格物，法之未立，学者将安适从乎？故以了悟为高者，直谓格言大训为胸中之障碍。书且无取，何取于法？以记览为工者，又不过夸多斗靡，务以荣华其言，希世取宠而已，法于何有？过犹不及，等之为无。得于道也，不有先觉，何以淑其后？

紫阳夫子生于建炎庚戌⁽²⁾，上符 [相合。如：上符天，下合地] 洙泗之运，远绍濂洛⁽³⁾之传，吐辞为经，家藏人诵，言满天下，皆去言也。然门人辅公所编读书之法，所以呼迷涂而饬稚，昧者尤为深切著明。甲寅便殿奏疏⁽⁴⁾，拳拳以为食芹之献，直谓“此愚臣平生艰难辛苦，已试之效。虽帝王之学，无以易之，岂苟云乎哉！”洪尝与